



再版序言

《博古和毛澤東》一書2009年3月出版。很多看過書的朋友對我們說，「你們的書實事求是，講真話，為研究黨史做了一件有益的事。」也有朋友提出疑問：「福銓怎麼知道這麼多故事，我的父母就從來不給我們講黨內的事情。」還有研究者指出該書很有價值，但缺少考證註釋，希望加以完善。

借本書再版之時，再說一點我自己的看法。

秦福銓能知道並記錄下這麼多黨史故事，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條件。

福銓是跟隨父母在香港長大的，1949年全國解放時已是20歲成年人。在他成長的環境中，沒有受過太多的「訓服工具」的教育，也沒有什麼組織紀律的束縛，這使他能夠保持有較多的獨立思考能力。當他聽到對一些歷史事件不同的說法時，他有疑惑、有思考，他想探求真相。這和我們當時很多聽黨的話，絕對相信毛主席「一貫正確」的青年人是有差別的。他的這種性格，難以適應當時國內的政治環境，也是他後來一生坎坷的重要原因，但這並不是他的過錯。

福銓雖然是學技術的，但對黨的歷史有濃厚的興趣。他看了很多歷史書，留心收集有關的資料，有機會就討教、提問，他對公開宣傳與事實不符的事情尤為關注。當有機會通過父親的關係認識一些親歷者和知情人時，他主動討教，探求歷史真相，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。

對比之下，我們這些一直在革命隊伍中成長的青年，也接觸很多革命前輩，但我們沒有明確的意識去瞭解、去探求，甚至連「黨史也可能有誤記」這樣的念頭都不曾有。不僅如此，我們會「向黨交心」，

把聽到的「反毛澤東、反黨」言論向黨組織揭發，以表立場堅定。有誰敢和這樣「聽黨的話」的青年談黨史真相呢！所以我們很多事情不知道，也很自然。

已經可以證實，中共官方黨史對一些事件的記述確有不符歷史真實的地方。諸如富田事變、反「AB」團肅反擴大化、寧都會議、大轉移（長征）的決策、湘江之戰、遵義會議、西路軍失敗等等，對很多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有不實之處。徐向前、李先念運氣好，活到了文革之後，方才說出西路軍失敗的真正原因，親自為自己和西路軍爭得一份真實的歷史記錄。博古 1946 年（39 歲）就犧牲了，只有楊琳、潘漢年、嚴樸瞭解一些和他有關的歷史真相，當他們面對一個渴望瞭解自己的伯父，又主動向他們提問的秦福銓時，他們以對革命歷史負責的態度，把一些已過去十幾年的歷史真相告訴這位後代，希望能留傳下去。我認為這正是一個堅持真理的共產黨員的品格，是黨性在那種政治環境下的正確的體現。

像楊琳、潘漢年、嚴樸等這樣一些長期作地下工作，又親歷過那段歷史的老革命者，對那段歷史十分瞭解。類似周恩來和博古的談話這樣一些有重要價值的歷史片斷，博古已去世，周恩來不會說，只有與博古關係密切的潘漢年、楊琳知道，如果他們不告訴秦福銓，這段歷史就將永遠被埋沒。為此我們這些後來人應該感謝他們。這也讓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這些可敬的革命長輩們堅持真理、敢講真話的高尚品德。

近年來，民間對博古的研究已經取得很多進展，大量的歷史事實說明官方黨史對他的評價是不公正的。正如新華社前副社長吳文濤同志曾對「博古百年誕辰拍攝組」的工作人員說：「博古是一個忠誠的革命者，忠誠的愛國主義者、國際主義者、共產主義者；一個對革命鞠躬盡瘁，以身盡職的人，竟被扭曲為革命的罪人，這是令人痛心的，極不正常的，也是對他的最大不公。」

由於官方黨史定下的一些框框，我們看到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推出的歷史影視劇，仍多把博古作為負面人物表現，黨史研究中繼續把一切錯誤都掛到所謂六屆四中全會的「左傾」領導頭上。以至連大學的學者教授也加以發揮，竟把國民黨蔣介石殺害瞿秋白的罪行算到博古頭上。^① 這篇文章還得到發行很廣的某文摘編輯部的關注，把在一個文學雙月刊上發表的文章在文摘的頭版上轉摘，助其流傳全國。好在，時代總在前進，有人看不下去，寫文章有理有據地給以批駁。^②

近年不斷披露的一些歷史資料，直接或間接地進一步證實福銓聽來的黨史「故事」是真實可信的：

最新出版的《共產國際、聯共（布）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（13~17卷）》雖然很多重要史料沒有收入，但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實。如關於1931年10月8日召開的寧都會議決定解除毛澤東的軍權，調回後方主持政府工作一事，黨史歷來定調是「左傾」臨時中央的決定。事實上，先是中共蘇區中央局在9月30日給中央電報提議「想把毛召回到後方中央蘇維埃政府中工作」，^③ 而中央10月7日給蘇區中央局的回電明確指示，「至於與毛澤東同志的分歧，我們再重複一遍，請嘗試用同志式的態度爭取他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。」「不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公開討論。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。」還特別提醒，「速發給我們補充信息，不要等到一切事實既成之

① 王彬彬：〈瞿秋白的不得不走，不得不留與不得不死〉，《鐘山》文學雙月刊，2008年第3期，第179頁。

② 曹春榮（原江西省瑞金市黨史辦副主任）：〈瞿秋白究竟是怎樣離滬、留贛和犧牲的？——由王彬彬的一篇奇文引出的話題〉，《黨史文苑》2009年3月。

③ 〈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（1932年9月30日）〉，《聯共（布）、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（1931~1937）》第13卷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，第208頁。

後。」^④然而在寧都會議上，蘇區中央局的多數同志（特別是後方的委員）堅持要召回毛澤東到後方工作，雖經周恩來的調和，同意改為讓毛留在前方，而毛以請病假為名，堅持不接受這種挽留，離開前線回後方工作。在造成了這種「既成事實」之後，蘇區中央局又向中央彙報，爭取中央的認可。^⑤

本書後記中提到土地革命和查田運動，指出黨史所記不實。發表在《炎黃春秋》2009年第3期的〈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和毛澤東〉一文，披露不少歷史真相，印證了本書所講的事實。例如楊尚昆說：「我最近想，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沒有『左』呢？比如說查田運動。你們現在看看有個文件那是很『左』的，那是毛主席搞的呀。那時總的當然他不當權，但是他做具體工作，他這個查田運動就是『左』的。」

劉英插話講了親身經歷：「我在零都第二次擴紅，他直接領導我。他給我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就殺。後來又來電話，要三天找出反革命。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一批人，硬說人家是『改組派』。我是覺得『左』的。後來是洛甫來了一封信，說反對擴紅不一定是反革命。我們才把這些人放了。」

楊還說，「任弼時那時認為毛主席有些東西不妥當，比如包括肅反，他認為毛主席有責任，但是毛主席從來不認為肅反他有責任。」^⑥

這本書主要寫博古和毛澤東，其實對那十年的歷史，黨史誤記的不僅是博古和毛澤東，還涉及很多高層領導，特別是對

④ 〈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（1932年10月7日）〉，《聯共（布）、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（1931~1937）》第13卷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，第212頁。

⑤ 李海文主編：〈任弼時、項英、顧作霖、鄧發就寧都會議的經過與爭論致中共中央的電報（1932年11月12日）〉，《周恩來研究述評》，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。

⑥ 張培森整理：〈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〉，《炎黃春秋》2009年第3期，第35頁。

周恩來、朱德、項英、任弼時、張聞天的記述都有不實之處。

對待歷史事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，可能有不同的解讀，但是歷史事實本身卻只能有一個。不論如何解讀，必須實事求是，尊重和依據真實的歷史史實。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核心，是共產黨的優良作風，也是治史的基本準則。

當前，中共黨史研究迫切需要提倡「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」。為此要破除各種禁錮，創造寬鬆的環境，讓人們敢於講真話。應該提供研究條件，開放歷史檔案，特別是土地革命時期，已經過去 70 多年的歷史檔案，應儘早解禁。

中國共產黨的黨史當然應該由共產黨人自己來寫。以各級黨史研究機構為主，集社會民間之力，拿出一部高水平的黨史，真實地記錄史實，公正地分析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，全面準確地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，切實起到以史為鑒的作用，已經是不能迴避，不容拖延的歷史使命。

如果《博古和毛澤東》一書能夠為編寫真實的黨史提供一些史實素材，能促使人們重視黨史存在的問題，則是福銓和我們的最大慰藉。

至於該書缺少考證註釋，的確是個缺陷。和博古有關的歷史，大多涉及黨的高層，知情者圈子很小，保存有較多證據的共產國際重要檔案至今未開禁，不易找到直接證據或旁證，本書作者秦福銓也已去世，對本書做大的改善已不現實。

今後如發現新的檔案資料有助證實該書內容，或證實該書誤記之處，遇有機會再印時，我打算採用加註或補遺的方式給予說明。

此次再版是因初版售完，需重印，僅對初版存在的錯別字做了修改，有幾張質量不高的照片做些改進和更換。

李海淵

2009年9月9日